

文史哲研究丛刊

中国古代文论元范畴论析

气、象、味的生成与泛化

杨星映 肖 锋 邓心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中国古代文论元范畴论析

气、象、味的生成与泛化

杨星映 肖 锋 邓心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论元范畴论析：气、象、味的生成与泛化 / 杨星映，肖锋，邓心强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8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7634-0

I. ①中… II. ①杨… ②肖… ③邓…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论—范畴论—研究 IV. ①I206.2



文史哲研究丛刊

中国古代文论元范畴论析

气、象、味的生成与泛化

杨星映 肖锋 邓心强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6.125 插页 2 字数 400,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978-7-5325-7634-0

I · 2923 定价：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由杨星映教授领衔撰写的《中国古代文论元范畴论析——气、象、味的生成与泛化》一书，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面世。付梓之际，杨教授来函命我写序。星映先生是我向来尊重的古代文论、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先师敏泽先生是其答辩委员会主席，于是她对我向来有学长之风，并且多有学术联系，多年来我从她处所获教益颇多，因而，自然不敢推诿。现仅就我拜读该著书稿之后的感受，谈谈自己的一些浅显看法，权当为序。

多年来，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范畴及其体系研究一直受到关注，在学界同仁的努力下，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从而有力地推进、深化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乃至整个传统文论研究，促进了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发展。同时，古代文论范畴研究还以积极的学术姿态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核心价值、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而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促进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进程。杨星映教授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具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多年来一直关注、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所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也颇有新意，并且引起学界同行的关注。即将出版的这部《中国古代文论元范畴论析——气、象、味的生成与泛化》专著是由杨星映教授设计、论证、申报的一项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并且由她领衔，与弟子肖锋、邓心强等合作撰写而成，师生通力

合作,精心结撰,允为美谈。笔者以为,该著是近年来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面的一项创新性学术成果,其出版将给传统文论范畴研究带来新的活力,并且有力地推动传统文论范畴研究的学术进程。

关于传统文论范畴之核心及其体系生发,杨星映教授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气、象、味三个元范畴的发生、衍变及其相互渗透、交融及泛化,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和范畴群,并且构建起了传统文论具有自身学理结构的主干网络体系。她还认为,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及其范畴体系是中国古代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思维方式的产物,具有直觉感悟、体味品评的特征和以象喻评论分析的言说方式,体现出一种具象与抽象统一、体验与概括相结合的特点,此与西方建立在知性分解基础上以抽象的范畴概念构建理论体系形成明显的不同。星映教授还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理结构是以元范畴→核心范畴→范畴群构成网络,来表述文学的规律及有关的原理原则。而气、象、味元范畴及其网络是中国古代文论网络体系中最主干的网络,研究气、象、味的发生、衍变及相互的渗透、交融、泛化,也就是研究古代文论范畴在理论指向和审美诠释方面的多功能性、所具有的较广的内容涵盖面和阐释界域,在理论视阈方面体现出的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相浃相洽的特点,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学理结构、思维机制与民族特色。应该说,这一认识对于古代文论范畴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知道,以往对于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是分散的、“各个击破”式的,而对主要范畴间的相互渗透、沟通、派生的梳理及范畴网络结构的事实性描述则少有具体研究成果;宏观抽象论证多,从系统性、生发性、衍变性、阐释性的角度将“气”、“象”、“味”三大范畴进行梳理、整合,研究其衍变和泛化者少。此外,在结合古代思维方式和古代文化深入细致地探讨古代文论范畴的生成、衍化方面做的也非常不够。针对以往研究中的这些不足,该著在这些

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故而在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学术突破,其对于阐述古代文论范畴概念的结构特点和学理特征,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科的发展深化,乃至对于古代文学、文艺学的研究和教学,均大有裨益。

该著共分为三编九章,另有“前言”与“结语”。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笔者曾经对传统文论范畴和体系及其特征作过一番研思,并且通过几篇学术论文阐述了自己的一些不甚成熟的学术见解。现在拜读星映教授等的这部专著,其中对于传统文论范畴、体系结构及其成因的一些认识,可谓是深得我心,对于启发我今后进一步体认传统文论范畴和体系特征,及其理论言说方式,大有裨益。笔者认为,书中的研究和学术见解,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与肯定:

一、对于气、象、味范畴之根基——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阐述。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观察和反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决定着该民族的文化形态和精神生产的特色,当然也决定着该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该书著者认为,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根基,因而着力论析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产生形成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对中国文化和理论思维的影响,并进而阐述了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影响。

二、对于气、象、味范畴生成和泛化的哲学基础的深入研究。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往往源于中国哲学范畴,是由哲学范畴转化衍生而来,而这些哲学范畴衍变为文论范畴后,这些文论范畴在其后的演化过程之中,其内涵外延往往随着作为其母体的哲学范畴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地拓展自身,由此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文史哲理论范畴相互交织、相互扭结、相互重叠、相互借用、相互影响、相互伴行、相互贯通的独有现象。该著通过对气、象、味在传统哲学中的发展历程的梳理,对其内涵外延的变化作了

总结陈述,即论证了哲学气、象、味范畴的逻辑认知起点、中心内涵的确立,论述了从先秦到汉唐至宋元明清哲学气、象、味范畴内涵外延的变化和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细致的过程考察,清晰地展示了气、象、味从哲学范畴演变为文论范畴的衍生过程和批评实践,从而揭示出了文论范畴气、象、味所具之深厚的哲学基础。

三、对于文论范畴气、象、味在魏晋六朝时期形成情形的考察,对于气、象、味范畴内涵与外延的细致梳理和深入诠释。魏晋六朝时期是传统文论范畴创生的自觉时代,因此该著对于魏晋六朝时期气、象、味如何从古代哲学范畴向文论范畴转化衍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作为文论范畴的气、象、味,实际上是在魏晋六朝时期通过具体的批评实践而得以确立和成熟的,这既是先秦以来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这个时期活跃的思想文化氛围使然。玄学、人物品藻、佛学以及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等在促使哲学范畴向文论范畴转化,在文论范畴气、象、味的审美意涵衍生、拓展的历程中,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催化的作用。该著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著者以大量批评史料充分论析了气、象、味范畴及其衍生概念的创生、演化、流布情况。同时,著者还对气、象、味作为文论元范畴如何确立、如何通过相互渗透交融而派生和衍变出各自庞大的范畴群和概念家族,对它们的定义和功能与批评指向,做出了较为清晰的阐发。这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确实可以将文论范畴气、象、味的生成演化过程和内涵诠释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四、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特征和体系结构之总体性勾勒与描述,以及阐述影响古代文论范畴和体系特征呈现的深层原因。尽管气、象、味不等于传统文论元范畴之全部,但是对于传统文论元范畴生成、内涵及特征的研究而言,它们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该著通过对“气”、“象”、“味”范畴的形成和发展、其内涵外

延的辨析,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和论析了古代文论范畴的感悟与分析交互为用、具象与抽象统一、确定性与多样性并存,以及具有模糊性、包容性、延展性、浑融性等特征。此外,书中还通过“气”、“象”、“味”的泛化来论证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结构是由元范畴推衍出基本范畴即子范畴、核心范畴,再互相交融而衍生出许多范畴概念群,从而经纬交织、整体贯通,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梯级范畴网络,这对于揭示古代文论范畴概念群及其特点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范畴是思维的逻辑形式,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不同的逻辑形式即不同的范畴系统;范畴是对研究对象性质和特征的概括,范畴之间的联系即范畴的系统反映了事物的联系与规律,特定的范畴系统构建了特定的学科的体系结构。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最大的文化差异和理论形态之不同,在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传统对立统一、即体即用的整体有机把握思维方式的产物,形成自身的范畴脉络和结构体系;而西方文论则是一味地以抽象的范畴概念构建理论话语体系,以逻辑推演、二元剖分、反复颠覆毁裂为方式方法,后出者通过否弃前在者建立自己话语的合法性依据。又,中国传统文论讲求理论批评与创作处于同一场域之内,场外征引往往是批评之禁忌,这实际上意味着理论批评要注重在体验的基础上进行概括提炼,传统文学批评与文论范畴之言说方式和理论形态的呈现,正与这点相关。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的关系,再加上因为理论视角融合、交汇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个范畴组成复合范畴这一特点,便出现了一系列范畴与范畴家族,即由一个核心范畴统摄众多范畴、概念、命题的范畴群,不同的范畴群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勾连的关系,从而构成传统文论的整个范畴网络,这个网络便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中若干范畴群便是若干个大的理论阐释系统,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理结构主要就是通过此

而体现出来的。上述这些,在该著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揭示,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论范畴网络系统和逻辑关系的解析,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理原则和体系结构的剖析,更是对传统文论民族特色所作出的符合实际的准确诠释。

该著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所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1.微观与宏观结合,训诂考据、史料梳理与理论阐释结合,使理论阐释建立在丰厚的资料基础上,从而使书中的阐述更具说服力。
- 2.哲学研究与文论研究结合,使文论气、象、味范畴的来源、衍变过程更加清晰可辨,使文论气、象、味范畴内涵外延的变化更易于理解把握。
- 3.运用比较方法,通过比较中西思维方式、中西文论范畴特征、中西文论学理原则和体系结构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来彰显中国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和理论成就。
- 4.注重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视界融合,通过大量例证来说明文论气、象、味范畴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衍变并被不断提升。这是因为,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创作实践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土壤,传统文论范畴是在传统文学的土壤中发芽、分枝、开花、结果的。
- 5.注重传统诗文评、画论、书论、乐论等的会通研究,将诗文评中气、象、味范畴的衍变泛化与其他艺术门类中气、象、味范畴的衍变泛化相互比较、相互印证。笔者以为,这方法在传统文论范畴研究中,尤其值得提倡。

笔者一直以为,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概念、术语、命题系统,来挖掘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度学理结构,应该是当下古代文论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它是揭示传统文论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言说方式之根本途径,有益于总结、提炼传统文论的理论思维机制和美学精神,彰显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文化特色与成就。而即将面世的这部《中国古代文论元范畴论析——气、象、味的生成与泛化》著作,从气、象、味等元范畴的发生和泛化入手,力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总结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系统,探

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理结构与民族特色,正可谓抓住了古代文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学界同仁高度重视之。

党圣元

2015年6月22日于京北农禅斋

目 录

序	1
前言 中国古代理论与古代文论范畴	1
一、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	2
二、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影响	11
第一编 “气”范畴的生成与衍变	
第一章 “气”范畴的生成	28
第一节 “气”哲学范畴的产生与发展	28
第二节 “气”哲学范畴的内涵与外延	41
第三节 “气”从哲学范畴向文论范畴的衍变	48
第二章 文论元范畴“气”的确立与成熟	57
第一节 文论元范畴“气”的确立与成熟	57
第二节 文论元范畴“气”的内涵与外延	78
第三节 影响“气”范畴成熟的诸因素	87
第三章 文论“气”范畴的泛化与发展	98
第一节 文论“气”范畴的泛化	98
第二节 文论“气”范畴群的形成	129

第三节 艺术理论中的“气”审美范畴 148

第二编 “象”范畴的生成与衍变

第四章 “象”范畴的产生和发展 166

第一节 “象”的产生 167

第二节 “象”哲学范畴的产生 176

第三节 《周易》“象”论概观 189

第四节 “象”的泛化 204

第五章 文论元范畴“象”的确立与泛化 218

第一节 重要名家论“象” 218

第二节 创作实践对“象”范畴转化的推动 228

第三节 文论元范畴“象”的内涵与外延 248

第四节 文论元范畴“象”的泛化 267

第六章 影响“象”泛化和成熟的诸因素 293

第一节 玄学与“象” 293

第二节 人物品藻与“象” 301

第三节 佛教与“象” 314

第三编 “味”范畴的生成与衍变

第七章 “味”范畴的生成 326

第一节 “味”哲学范畴的产生 326

第二节 “味”哲学范畴的衍变 338

第三节 “味”从哲学范畴向文论范畴的衍变 347

第八章 文论元范畴“味”的确立与成熟 354

第一节 文论元范畴“味”的确立与成熟 354

第二节 文论元范畴“味”的内涵与外延	380
第三节 影响“味”范畴成熟的诸因素	386
第九章 文论“味”范畴的泛化与发展	400
第一节 文论“味”范畴的泛化	401
第二节 文论“味”范畴群的形成	406
第三节 各门艺术中的“味”审美范畴	446
结语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特征和体系的建构	468
一、古代文论范畴的特征和体系建构	468
二、影响古代文论范畴和体系的深层原因	474
参考文献	485
跋	499

前言 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与古代文论范畴

范畴是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普遍联系、本质联系的概括，是各个知识领域的理论支点。列宁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①此话也可以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正是把握文学现象的理论之网的网上纽结，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系统或曰体系正是由范畴网络构建的。中国古代文论范式与西方文论范式的不同首先在于范畴的特质与系统的不同。我们必须厘清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特征与其系统的特质，才能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范式和体系建构。

作为文学理论系统的构成要素，虽然中西范畴都是对文学的本源、创作、欣赏（从而也涉及创作主体、欣赏主体及二者关系）等的表征，但西方文论的范畴是剥离事物表象的抽象的、以知性分析来界定的指称性确定概念；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则是体验与概括结合、具象与抽象统一、确定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具有模糊性、包容性甚至形象性的范畴。其次，范畴系统的建构是不同的，西方文论的范畴系统是按照从本质到现象分门别类来构建，而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系统是由元范畴推衍出基本范畴即子范畴，再互相交融

^① (俄)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8 页。

及衍生出许多范畴群，从而整体贯通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梯级范畴网络。^①

为什么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范式即范畴的特点及系统的构成与西方文论不同？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文论的思维方式不同。古代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文学理论话语和学术范式的不同。

一、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

什么是思维方式？思维是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动过程，包括认识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它既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②思维方式指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动过程中意识的走向、路径，观察和反映对象的方式和视角，它决定了我们把对象看成什么、在对象中看到什么。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观察和反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决定着该民族的文化形态和精神生产的特色，当然也决定着该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正是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成和传承着中西不同的文化，决定和传承着中西文学理论不同的体系、形态、研究方法与表述方式。思维方式犹如各民族的文化“基因”，正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理论批评的性质特征，所以，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和体系建构，应当追根溯源，“原始

^① 不少学者已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呈梯级发展，如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蔡钟翔、陈良运《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总序》，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等，我也有共识。

^② 本书采取思维和意识相等的涵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思维”条的解释是：“思维有二义：广义上是相对于物质而与意识同义的范畴；狭义上是相对于感性认识而与理性认识同义的范畴。”《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页。

要终”,“执本驭末”,梳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影响制约,抓住了这个根本,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特征和其系统的特质,才能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范式和体系建构。

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对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它重视实践、实用、经验的积累,十分关注现象和具体事物,不是剥离表象而仅以概念进行推理、论证,而是以对事物原貌的整体观照和事物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来把握事物,将感性与理性、经验与逻辑、概念与现象相统一,以此把握事物的特征和规律。古代希腊人的思维更多的是关注客观对象的抽象本质、一般性。“这在宗教生活中表现为神,在哲学思想中表现为存在,在自然理论中表现为原子,在数学知识中表现为公理,而在逻辑学中则表现为本质或属性。”^①而古代中国人一般不作脱离实践或具体事物的概念推理,不热衷于探讨事物的抽象本质。也许,这导致了古代社会抽象思维的不发达,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但是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它却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性。这种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思维方式的产生源于华夏大地远古先民生活的地理环境和农耕生产的生存方式,并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血缘氏族宗法社会结构中不断得以巩固。

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远古中西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是中西不同的社会存在,成为产生中西不同思维的土壤和基础,导致了中西古代思维形态的不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远古人类意识的产生受制于生存环境。地理环境对人类意识发生所起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人类“文化初期”,“外

^① 吾淳《中国思维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2 页。

界自然条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 自然条件、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思维的发生期“其(上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其(下限)大致可以新石器时期晚期为界”。这一时期“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已透露出与欧洲人不同的思维倾向”^②。在生存环境极为艰苦的远古时代,原始人的全部生活、全部注意力就在于生存资料的获取,而生存资料完全取决于地理环境。因此,地理环境及生存资料的获取方式便必然影响人类的心理塑造与思维方式,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在这时是直截、明了的。根据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研究,作为思维和文化发源地的中国大陆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旧、新石器时代气候温暖湿润,土地松软易开垦,动植物种类繁多。古书中关于植物种类的记载很多,例如《尔雅》的《释草》中包括一百多种草本植物,其《释木》中有几十种木本植物;《山海经》中的药物据统计有 132 种^③。而考古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上百种,今天留存下来的动物不足其一半。^④ 与此同时,同纬度的西亚气温高雨水少,干旱与半干旱的气候特征明显,属于典型的荒漠地区。欧洲则由于第四纪大冰期的影响,气候变得比以前寒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生物种类,例如植物种类大大减少,常绿阔叶林很少,夏绿阔叶林和针叶林品种贫乏^⑤;动物主要留存下来的是耐寒的大型动物,这在同一时期的洞穴绘画中得到了反映^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60 页。

^② 吾淳《中国思维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 页。

^③ 参见赵璞珊《山海经记载的药物、疾病和巫医》、《山海经新探》,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 页。

^④ 参见张之恒、吴建民《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5—91 页。

^⑤ 参见刘德生主编《世界自然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1、82、102 页。

^⑥ 参见吴汝康、吴新智《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70、188 页;陈兆复、邢琏《外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章。